

引言 我们是谁？

唐代大诗人李白做梦也没想到，他那名垂千古的“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”的诗句，竟然拉开了现代人同四川的意识距离。尽管今天现代交通、通讯和信息技术早已把四川与全国乃至全球连在一起，然而四川留在人们头脑中的意象，仍然是那样的陌生和荒疏，以至人们常用偏僻、遥远等字眼来加以形容。

而作为四川盆地的主人和巴蜀文化传人的四川人，在人们的精神空间和现实生活中的地位，则不是那么随意可以忽视的。

四川人是中国人中数量最庞大的人群，川、渝分治前，四川人口总数超过一亿，在全国每 10 个人中便有 1 个是四川人。这一人口数量仅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国家可以匹敌，让你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她的存在价值。

四川人又是中国人中历史悠久、文化积淀丰厚、心理因素稳定、性格特征鲜明的人群。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，在重大的历史关头，四川人总会以自己的作为，为历史留下深刻厚重的笔触。从

而把四川与天下连在一起，并让天下少不了忘不得四川人。

四川人创造了辉煌的“天府文明”，从上古时参与开发这块土地的文化始祖算起，到今天为止，几千年的历史篇章上，留下了我们世代繁衍生息、辛勤耕耘在四川盆地的生动记录。四川盆地一直就是我们四川人生命的摇篮，心中的天府，生我养我的桑梓故里，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。

四川人曾经在川西平原上，描绘了一幅令天下人称羨的锦绣“天府”的美丽图卷。直到近代以前，天府文明还一直是我们四川人拿得出手的一张“名片”。借助这张“名片”，四川人在天下人面前显示了自己的斤两和份量，中国历史也依托于天府，演绎过无数壮观的场面。

翻开中国封建王朝大一统的历史，秦并天下，汉定关中，隋平江南，无不依靠四川人的鼎力支持以成大业。“是故从来有取天下之略者，莫不切切于用蜀。”因而，我们脚下这块土地，一直被历代封建王朝视为“王业之基”，无数英雄豪杰看成“风水宝地”。

反映古代中原人观点的名谚：“天下未乱蜀先乱，天下已治蜀后治”，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四川人在天下的地位。尽管各时代人们的“治”、“乱”观各不相同，四川人在其中的责任另当别论；但天下的治乱安危，偏爱与四川人“勾搭”的现象，则是公认不讳的事实。

抗日民族战争的漫天烽火，更在历史上锻铸了一段天下人心系天府，四川人心连天下的特殊情结。退守无据的国民政府，只是在四川人以及四周崇山峻岭的庇护下，才建立起维系半壁河山的“民族复兴基地”。而广大无家可归的流亡人群，也正是由于热情宽厚的四川人的收容接纳，这才觅得安身立命之地，并由此构建了他们在精神上一段难解的四川情结。

四川人一向恪守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，一般不轻易离开素有“天府之国”美誉的四川盆地。是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冲破了盆地的壁垒禁锢，开拓了四川人的眼界，使他们有机会跨出夔门，领略天下无限风光，欣赏人间精彩世界。于是，四川人不安于现状了，在全国民工潮中，出现了百万“川军”闯天下的壮举，天下从此尽知四川人。

如今，从东海之滨，到珠峰山麓，从南国绿茵，到北疆冻土，皆有四川人。古人评价宋代柳永词传播之广说：“凡有井水饮处，即能歌柳词”。套用这句话，可以说：凡有井水饮处，即有四川人。今天举目四望，普天之下，四海内外，无处不见四川人的身影和足迹。

真正让四川人感到自豪的是，一批在中国现代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四川籍革命元勋，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、世纪伟人邓小平，以及朱德、陈毅、刘伯承、聂荣臻、杨尚昆、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他们的丰功伟绩和光辉形

象，长留人间，赢得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尊崇。他们以自己是四川人为荣，四川人因他们而名扬满天下，天下人因他们而知四川人。

今天，四川人肩负着建设“新天府”的历史重任。当现代文明以不可阻挡之势向我们迫近的时候，农业时代“天府文明”的光辉愈显黯淡失色，内陆盆地的阴霾便呈现出来了。在通向现代文明的跑道上，我们四川人虽然曾经在改革开放的前年一度领先，获得过“改革之乡”的殊荣；但在随后的较量中，却明显地落于各路经济强人之后。今天，一个严酷的现实摆在面前：我们四川人确实落伍了！

重庆脱离四川成为直辖市，使重庆人成为“曾经的四川人”，使四川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和挑战。“天府失重庆，四川待重兴”。四川人面临着一次新的历史机遇，一幅工业文明基础上的“天府之国”的最新最美的图画，正等待着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去描绘。

未来世纪的格局，正朝着“全球经济一体化”，“世界公民地球村”的方向发展。四川人走向天下，天下人走向四川已成必然之势。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，国家开发战略重点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，已有越来越多的四川人走出盆地闯天下，有越来越多的天下人跨越蜀道进四川。为了在四川人与天下人之间构建一座精神上沟通的桥梁，身为四川人的我们，便有了以《天下四川人》为名，撰写这本小

册子的打算。

老舍先生在其名著《四世同堂》中说：“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，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，像水中的鱼似的，他不能跳出水去看清楚那是什么人。”我们深知，由于拉不开与自己生存的文化环境的差距，本地人往往很难说清楚自己的思维与行动。但同时也懂得，视角的限制，是可以通过调整聚焦来增加穿透能力的道理。因此，我们力图超越自我，尝试构建起自我反思和“解剖”的体系和架构，以便从心理上打通四川人的“任督二脉”。

全书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：我们是谁？我们从哪里来？我们是如何生存的？与外省人相比，在文化上有哪些特点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将如何发展？走向何处？为什么在四川往往存在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，“外来和尚好念经”的现象，为什么四川人不出夔门难以成龙，为什么在商业社会中，四川人只配当“打工仔”，大款阔老大都是外省人……

为此，我们从四川人思维和行动方式中，选取了：四川人的性格情貌、外在表现、内心世界、处事之道、为人之道、价值追求、精神气度、人生哲学，以及自我反省等几个“切片”来进行剖析，试图对蕴藏在四川人外表和内心世界中的“密码”作一番“破译”。

当然，这只是我们的主观愿望和个人见解，既非“权威定论”，更非“标准答案”，目的仅在于抛

砖引玉，引起大家的共同关注，共同思考，共同实践，以便共同来完成时代布置给我们四川人的“家庭作业”：塑造现代四川人的新形象，创建 21 世纪的新天府。

第 1 章：我们从何处来？

——四川人的构成及分类

宋真宗下诏分“四川”，康熙帝御批“四川人”。

四川人祖先来自“时光隧道”，现代居民来自四面八方。

蜀文化是“化合物”，大“换血”是“粘合剂”。

“尚文”川西人；“尚武”川东人；“尚仁”川南人；三分天下四川人。

1、四川人构成

四川人作为中国人构成中人数最多的居民之一，是怎样形成的？四川人又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呢？

● 宋真宗下诏分“四川”

当我们在 1998 年岁末推出这本小册子的时候
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世纪——21 世纪正向我们迫

近，再过 360 多天，全世界都将欢庆人类纪元的第二个 1000 年的到来！

随着新的历史纪元的到来，总会有许多新的景象接踵而至。在上一个 1000 年，那时人类还没有听说过火车、汽车、飞机，更没见过电灯、电话、电视、电脑……谁能预知，在下一个 1000 年，人类还会发明创造出多少新鲜玩意儿，让我们现在还活在世上的人目瞪口呆！

但是，在上一个 1000 年中，发生的一件事，却直接关系到我们四川人。我们之所以有“四川人”这个名称，而不是其他名称，正是在人类纪元的第一个 1000 年的到来的时候发生的。

在上一个 1000 年，也就是人类刚刚走过纪元 10 个世纪，开始跨进 11 世纪的大门的时候，正值我国北宋真宗皇帝在位。宋真宗赵恒，是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侄子，从小在皇宫中长大，深得他伯父的宠爱。一次，他居然跑到万岁殿，爬上龙床御座戏耍，不巧被赵匡胤碰见了，赵匡胤不仅没责怪这个调皮可爱的侄子，反而感到惊奇，于是，他抚摸着侄子的头问：“天子好作吗？”幼年的赵恒回答道：“听天由命吧！”

后来，这个孩子果然受“天命”的惠顾，在大哥被废黜，二哥短命的情况下，作为“老三”的他，登上了这个皇帝宝座。他就是大宋帝国的第三任皇帝宋真宗。据说，宋真宗一生行事效仿唐玄宗，他原该叫宋玄宗，只是因为避讳才不得不改为

真宗。咸平四年，即公元 1001 年，他就在这个座位上，步唐玄宗的后尘，下达了一道与我们四川人有关的诏书：“分川峡转运使为益、梓、利、夔四路”。

这是一项调整行政区划的决定。原来，上古时我们先民在盆地及其四周创造四川文化的那个区划，在秦时置为巴郡、蜀郡，汉代叫益州，唐代改为剑南道，后分为剑南西川道和剑南东川道，分别在成都和三台设立治所。在唐玄宗以前的行政区划，只有东、西两川，故简称“两川”。唐玄宗时，他又对此区划作了调整，有了剑南西川道、剑南东川道和山南西道的设置（山南西道辖今陕南、川北地区，治所在汉中）。这样，便有了“三川”的简称。现在，由于宋真宗这一调整，又在益（成都）、梓（三台）、利（汉中）州三州之外，新置夔州（奉节），于是，这一区域在宋代便被称为“川峡四路”，后来就简称为“四川”。这就是我们“四川”的来源。

在今天看来，人类 1000 年中发生的事情，多如牛毛，难计其数。有如浩瀚太空，星球无数，我们生存的地球，只是银河星系中 2000 多亿颗中的一颗，恒星、行星、卫星都来不及细数，更何况弥漫的星云尘埃。老实说，这行政区划的名称，原本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，区区小事，微不足道。相对于人世间惊天动地的大事来，的确是“马尾穿豆腐——不值一提”。但对于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

人口大省的四川人说，却是不能忽略不计的。

须知，要不是唐玄宗的那项分“两川”为“三川”的决定，我们四川人说不定只该叫做“两川人”。要不是宋真宗效仿唐玄宗的那项分“三川”为“四川”的决定，我们四川人说不定只该叫做“三川人”。我们之所以叫做“四川人”，而不是“两川人”、“三川人”，或者别的什么名称的人，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忘记他们的这当然不是“谢主龙恩”似的顶礼膜拜，而是出自于一种文化追思，一份怀旧情意。对于重感情的四川人来说，这点尤为重要，因为我们是最忌讳数典忘祖的。

● 康熙帝御批“四川人”

如果因为作出了有关“三川”、“四川”决定，就该大书一笔的话，那么，清朝鼎鼎大名的康熙皇帝的一道诏书，就更值得写上几句了。

行政区划的调整，只不过为四川和四川人得名制造了依据，毕竟还不是命名本身这正像宋真宗作出分益、梓、利、夔四州的决定后，并未立即产生四川的命名一样，只是在过了大约 110 年，即到了北宋末年执政的宋徽宗时，他才在一份诏书里，把这四州简称作“四川”。而从“四川”到“四川人”的命名，则更需要有一个时间酿造过程。

这里，不仅有一个称呼习惯问题，更有一个认识思维的问题。

从称呼习惯讲，居住在四川盆地的人，无论自

称还是他称，也无论是四川行政区划形成以前还是以后，他们一直都是以“蜀人”作为代号的。由于起源于川西平原的蜀文化，在这一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中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，它理所当然也就成为凝聚这一地区人民的文化精神。因此，“蜀人”便是包括历史时期东西两川人的共同称谓。要改变这一习惯称呼，还必须有待于一个完整、清晰的四川人的概念产生以后。

从认识思维讲，中国人讲人，从来不注重个别的人，而更重于人伦，习惯于重视纵向思维，而忽视横向思维。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曾经说过，中国古代，纵向关系远远强于横向关系，因此很难有明晰的、整体意义上的“中国”概念。同样，“‘中国人’这一概念在整体上的明晰化，也应该是在与不同属类的人的较大规模地遭遇之后。使之明晰化的眼光，可能来自于外国人看中国人的目光，也可能来自于中国人在了解外国人之后所作的比较和反思。”（《中国人丛书·序》）

“四川人”作为一个他称，作为一个与外省人相区别的独立的概念，只有到了四川与外省人民的交道频繁，因而有了明确划分的需要的时候，它的出现和使用，才会是水到渠成、瓜熟蒂落。这个时候，只有到清初移民出现高潮，形成所谓“湖广填四川”运动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。由于来自各省移民，在四川境内屯垦，免不了发生各种矛盾和冲突。为了区分他们的原籍，便会在使用陕西人、湖

广人等的同时，不可避免地要产生“四川人”的概念。

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清朝的康熙皇帝最先在他的一通诏书中，正式使用了“四川人”的概念。他在 1712 年的一通圣谕中说：“湖广、陕西人多地少，故百姓皆往四川开垦……湖广入川之人，每每与四川人争讼，所以，四川人深怨湖广人。”在这里，四川人是与湖广人相对应的独立的清晰的称号和概念。

而在此前，明末清初就在四川传教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洛东（Gourdon），在其所撰的《圣教入川记》一书中，一直是使用“成都人士”、“成都百姓”、“四川人民”、“川人”、“川民”这样一些词汇来称呼当地的居民的。只有唯一例外的是，他使用了“非四川人”来区分一个叫利司铎的传教士，请求张献忠部下刀下留人，准予赦免。在外国人的目光中，也仅此而已，不过把与四川当地居民相区别的外国人，称之为“非四川人”，而并非专指“四川人”。可见，“四川人”这个名称，还真是从康熙大帝的诏书中走出来的。

从公元 1001 年产生四川行政区划的命名依据，到 1712 年正式形成四川人的概念，其间经历了 700 多年。“四川人”之走向我们，还真有点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味道。

● “时光隧道”走出四川人

从上古时众多民族在四川盆地融合为具有共同

地域文化精神的巴蜀民族群体后，又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继续同化众多的民族，最终获得了文化心理的一致性，构成一个以一定地缘、血缘和文化为纽带的群体，这就是四川人。今天，当我们上溯四川人的先辈来历时，我们的祖先一定是多元的。

有位文化学者说得好：“不论是为了‘文化’的目的而‘寻祖’，抑或为了‘寻根’而涉及‘文化’，都属于严肃的历史思索，而非简单的文化因袭。”的确，无论是寻根还是寻祖，都好像是在文化中找矿，在历史中探秘。我们的祖先既然是在创造文化中走向过去，成为历史，今天，我们为了寻找他们的踪迹，便不能不回溯历史，解读文化。

那么，四川人的祖先是怎样走向盆地？是怎样从遥远的年代走近我们的呢？

在那个遥远而古老的年代，蒙昧与蛮荒伴随着人类，没有文字记录，先民们只有通过留给后人的遗址、遗迹、遗物，向后代发出无声的诉说。以致我们今天的寻根问祖，都只能建立在考古学家的实地挖掘和鉴定之上。

且看距今 200 万年前的巫山人。那是在巫山县大庙镇的一个洞穴里找到的古人类化石。据说，这时的“人”已可以直立，已走出“猿”的属类，开始走进人类的生活范畴。过去说中国在 100 万年前没有人类化石，因此，人类的祖先来自非洲，亚洲的直立人是从非洲扩散而来的。现在，如果巫山人是直立人的话，不仅四川人的始祖，而且说不定亚

洲，乃至人类的始祖都可能是从这里踏入“人类演化的时光隧道”。

从人类学的角度看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，从 10 万年之前起，“智人”们便开始了分散性的文化创造。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 10000 年之前，史称旧石器时代。在这个阶段上，与陕西大荔人、广东马坝人、湖北长阳人、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等相并列的，还有发现于四川资阳黄鳝溪的资阳人化石，它们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。

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，在四川还有铜梁文化、资阳鲤鱼桥文化、汉源富林文化，距今约在 25000—20000 年之间。

旧石器时代离现实太遥远了，请看 10000 年以内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：

距今 5000—7000 年，四川有广元营盘梁遗址、绵阳边堆山遗址、巫山大溪遗址、广汉三星堆文化一期、西昌礼州遗址、成都市、青衣江、岷江上游文化遗址等等。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，为我们提供了先民们在盆地四周，从事以农业为主，兼及渔猎、采集、畜牧等经济活动的证据。

文化学上的常识告诉我们，地无分东西南北，人不论华夷蛮戎，都基本上是在文化的等高线上创造着各自的文明。植根各地的地域文明，之所以表现出强烈的文化差异性，就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分道扬镳的。在这一时代，黄河流域孕育出仰韶文化，长江流域生长出河姆渡文化，而我们四川则有

从成都平原生发出来的璀璨夺目的早期蜀文化，其中尤以三星堆文化最为著称

在距今 4500 年，在成都市新津县宝墩村发现的宝墩文化遗址，是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文化，已有明显功能标志的聚落形态——“城”出现。紧随其后的，还有都江堰的芒城、郫县三道堰的古城、温江的鱼凫城遗址。这些文化遗址表明，我们祖先的活动踪迹，已经进入成都平原周围，并且即将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

在距今 4700 - 3000 年前，有广汉三星堆文化 I 期遗址，在那里高高耸立着坚固的城墙，城墙外掘有深深的壕沟。南城墙外的两个祭祀坑中，掩埋着数以千计的举世罕见的大型青铜器、黄金制品、玉石器。方圆 2.6 平方公里的城圈内，分布着密集的生活区、宫殿区和手工作坊，显示我们的祖先已经在这里建立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。

与此同时，在成都十二桥遗址的第 13 层，出现了规模宏大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。在成都羊子山，一座高达 10 米的三级四层的供祭祀用的四方土台，也巍然屹立在平原之上

这一切表明，在距今 3000 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已经在成都平原创造出一个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中心。

在这个文明中心的基础之上，赫然耸立着一个可与中原夏商文明相媲美的古蜀王国。这个王国，初创于夏商之际，灭于战国晚期（公元前 316 年），

前后相续 1500 - 1600 年之久。结合古史传说和文献记载，这个王国经历了蚕丛、柏灌、鱼凫、杜宇、开明等王朝。

在这个中心四周，还有早期蜀文明的其他几个来源和组成部分。这就是从新石器时代多元性文化基础之上形成的，以岷江上游、绵阳边堆山、大渡河青衣江流域，以及川东三峡以至鄂西宜昌等地区为支点，所构成的广阔的空间构架。

从以上简要的轮廓中，我们大致梳理出四川人的祖先是怎样从遥远的时代，一步步地走向盆地，走近我们的。如果我们真要确认我们的祖先是谁，你能分辨出你是谁谁的传人吗？是巫山人，还是资阳人？是蚕丛、柏灌、鱼凫，还是杜宇、开明？与其奉这些飘忽不定的传说人物作为始祖，还不如把自己看作是他们所创造的文化的传人。

● 四川人认同蜀文化

同一个地域的人，之所以能凝聚在一起，共同的地域，只为人们共同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空间。要使他们彼此粘合在一起，还得有两个因素：共同的血缘、共同的文化。如果把前者比作是“物质”的“粘合剂”的话，那么，后者就是“精神”的“化合物”。

由于一定的人活在一定的文化中，反之，一定的文化也必然活在一定的人里。四川人之所以彼此认同，就在于他们有趋于一致的文化精神、文化心

理。这就是从成都平原孕育出来的蜀文化。

蜀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，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而是在不断与其他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充实自己，以致最终成为四川人共同的精神文化的象征。这只需要看一看蜀文化发展史上所经历的两次大的涵化，就十分清楚了。

蜀文化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兴起，到西周中期突然黯淡失色。在距今 2500 前的东周时期，由于巴文化的兴起，逐渐融汇为巴蜀文化，扩大为巴蜀大文化体。至秦汉时期，巴蜀文化又逐渐融汇入中华文化之中。这一文化交流影响过程，正印证了考古学上地方文化的发展与扩张模式：接触—冲突—交流—融合—整合。

由于东周以后兴起的巴文化，以及秦汉以来传入的汉文化，都是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内陆文化，它和蜀文化原有的性质与存在方式别无二致。所以，在经过这两度涵化以后，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意识流，蜀文化的传承渠道依旧，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心理观念、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仍会一代代接力传下去。

巴蜀文化和中华文化的涵化，不仅没有使蜀文化毁于一旦，恰恰相反，这两次文化融汇，正好成为推进蜀文化发展的两个里程碑。由于蜀文化被融汇到更为雄浑、博大、精深的文化精神之中，这无异于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。因此，在其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，蜀文化作